

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本书展现了详实的历史过程。据称,为了本书的写作,作者于2001年10月2日至11月4日赴台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先后考察了花莲慈济、新竹福严禅寺、中坜圆光寺和圆光佛学院、台中慈光寺、台中佛教会馆、中台禅寺、嘉义香光尼寺、台北泰北中学(原台湾佛教中学林)、玄奘大学、台湾中央图书馆、台中台湾省图书馆、南天书局、瑞成书局等,访问了有关学者如蓝吉富、江灿腾、阚正宗等,参访了台湾教界的惟觉、惠空、达和、如悟等法师。在台期间,作者收集了约5000万字关于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资料,主要有:《南瀛佛教》1至20卷(1923年至1942年);(日)丸井圭治郎《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温国良《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研究》;江灿腾、王见川《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王见川《台湾的斋教与鸾堂》;王见川《台湾佛教史年表:日据篇》;阚正宗《台湾佛教一百年》;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宗教篇);《台湾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1932年);(日)大桥舍三郎《真宗本愿寺台湾开教史》;蔡锦堂《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的宗教政策》;(日)白井朝吉、江间常吉《皇民化运动》;陈蓉玲《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宗教政策》等。

(作者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评述

王雪梅

观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领域最流行的信仰形态,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因其流传极其广泛、影响极为深远而为世人所瞩目,但观音信仰作为学术研究在学界特别是我国大陆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研究更是非常薄弱。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利安的《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中的一部分,专门讨论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渊源和流变。通观全书,无论是历史梳理还是理论剖析,均让读者对观音信仰这一历史而现实的宗教文化现象有了更清晰的把握。

本书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非常了解,开篇第一章就对观音信仰研究现状作了广泛而深刻的综述评析,其中不仅介绍了我国大陆及港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国外学术界主要是英语国家的学术成果作了详细的介绍。还特别介绍了作者本人多年来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由此让读者对当前国内外观音信仰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有个通盘的了解。正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国内外研究信息,使得本书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

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贯穿全书,即使在概念的界定以及历史名词溯源这样的细节上。如作者不仅在前言中规范界定“古代印度”、“观音”、“观音信仰”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专设一章为“观音”正名,依次考察了古译时代的观音译名、旧译时代的观音译名、“观音”简称的出现并非因为初唐名讳制度、新译时代的观音名称及关于新旧译名的争论。通过对观音译名的历史考察和义理辨析,作者指出:无论是“观世音”“观音”“观自在”还是不太流行的“庐楼亘”“光世音”“观世

自在”“观世音自在”“窥音”“现音声”等，它们都是古代以来，汉语系统对源于古代印度的这位大菩萨的指代。对观音的不同指代体现了不同的翻译背景和译本背景、思想和信仰背景，也表明中国人对这位菩萨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期待。由此可见，即使这样细微的词语辨析和正名仍然凸显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文献学知识以及本书追根溯源的宗旨。

本书是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探源溯流性学术著作，第三章到第八章就详细阐述了观音信仰在古代印度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流布的历史轨迹。经过作者条分缕析、审慎考察，其间论述不乏真知灼见。如在观音信仰起源问题上，作者就从学界忽略的观音道场来探讨观音信仰的起源，认为：自古相传的印度大陆南端解救“黑风海难”和“罗刹鬼难”的信仰，成为观音信仰的主要来源。这也正是观音居住的道场之所以位于南印度海滨而且是自古以来由次大陆通往楞伽岛的要道口的主要原因。又如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问题，传统认为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是净土往生型，作者对此提出了六点质疑，并通过考察认为：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点就是“称名救难”信仰，这种信仰集中体现在《普门品》这部经典中。作者除了从经典上（如净土、如般若、如密教）讨论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发展变迁外，还从宗教实践的层面（如信仰客体、信仰主体）探讨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灵验信仰的基本形态和流传，并指出经典观音信仰和实践观音信仰的差别，也正是二者之间的差别造成相互影响和融合，最终共同促成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发展和传播。

作者显然不满足仅限于探讨观音信仰在古代印度的传播，观音信仰和佛教的种种信仰一样，虽然源于印度，却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热烈而持久的反响。所以作者在最后三章叙述了观音信仰向中国传播的历史概况，并从正统佛教和民间佛教两个层面讨论了观音信仰的中国化问题。另外，作者还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提出，古代印度的救难性观音信仰之所以在中国很快获得传播，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信仰。进而作者认为，从宏观上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生根，不是两者相同或者经过寻求相同，不断使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主要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不同促成的。诸多论述，不仅让读者在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背景中了解观音信仰的渊源与流变，也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文化传播与演变的新视角。

观音信仰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在这个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宗教信仰背后都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流变和文化迁移？《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一书给予了合理的解答。通过此书，可以深度了解观音信仰从神秘的异域进入中土，从遥远的古代走到今天的历史画卷。读罢此书，原本只是停留在传说与信仰之间的观音，有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一些看似不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了新意（如谈到“观音”的名号问题）；模糊的问题清晰了（如观音信仰的形态问题），是似而非的问题澄清了（如观音的身世及性别问题）。

当然，本书也还有值得完善的地方。如作者第一章末尾所言，对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基本没有涉及。藏传佛教观音信仰是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传入中土所形成的观音信仰体系之一（即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民间佛教的观音信仰），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而系统地把握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播变迁。另外书中可以配上更多的观音图片并附上文字介绍（本书除了 p154 图片有“观音马头立像”的说明外，其余均未标注），以益于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有机结合。

（作者王雪梅，西北大学世界宗教与文化方向博士生，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